

文化转换中的 世界华文文学

黃万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转换中的世界华文文学 / 黄万华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10

ISBN 7-5004-2635-6

I. 文… II. 黄… III. 汉语-文学史-世界 IV. I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6923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山东滨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75 插页 2

字数 268 千字 印数 1 1000 册

定价: 16.00 元

再出几个林语堂

(代前言)

赵淑侠在她的散文集《天涯长青》(1994)的首篇《书展》中以其在西方文坛出入 20 年的体会谈到了林语堂 40 年代创作的影响。她说,中国文学作品和作家中,“真正能够像西方作家那样广泛被读者大众普遍接受的”寥寥无几,而林语堂,其在西方“文名之响在近代中国人里无人能比,他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至今脍炙人口,是中国新文学作品中,惟一一本可以进入西方的‘寻常百姓家’,为社会上一般消费者,像阅读他们自己的文艺小说一样,能引起读欲并喜爱的。1988 年法兰克福书展期间,瑞士驻西德大使设盛宴款待瑞士出席书展的作家和出版家,当众对我说:‘中国作家我只读过林语堂的小说,非常有趣。’他一句话没完,旁边两位出版家也随声附和,使我顿觉颜面有光,平添几分骄傲的喜悦。”她由此感叹:“我倒真

希望今天的中国能再出几个林语堂，为我们在世界文坛争得一角立足之地。”

大概因为林语堂在西方世界写了中国的鸦片烟和女人的小脚，“暴露了中国人的丑态”，所以其40年代的创作总难以定位。1996年林语堂百年诞辰，祖国内地难以开成相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多少反映了这种困惑。其实，西方文坛和读者广泛接受的，并非林语堂写了鸦片和小脚，看一看当代文学中在这方面比林语堂写得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一些作品并未受到西方青睐便可有所知悟。在我看来，40年代的创作之所以成为林语堂文学生涯中最重要的时期，不仅是由于林语堂一生近70种著述中，这一时期出版的作品数量最多、体式最广、质量不乏上乘（林语堂自述最喜爱的几部作品，如《京华烟云》、《苏东坡传》等都写于这一时期），林语堂作为双语作家的重要地位也由此确立；也不仅在于其创作的倾向、色调、意义等，在40年代中国文学的格局中显出跟这一时期文学主旋律的一种较独异的内在联系，从而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第3个历史时期的多元色彩；更在于他在异国他域用英文创作的文学作品，直接进入了最大语种的文化消费圈，向西方读者传达了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民现实生活的信息，从而大大扩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放性格局。

林语堂的创作能被西方世界广泛接受，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林语堂的创作主张历来富有个性。1937年，他迁居美国，异域写作的生活有可能使他疏远国内的社会、政治生活，但更有可能使他在怀国思乡的心境中获得一种蕴涵着关于战争、民族、家国的忧患意识的创作视野。这种超脱了国内现实政治派别纷争而又联系着国家命运的创作视野，和林语堂向西方世界介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旅美动机，构成了林语堂40年代的创作轨迹。而能否借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一些不乏时代气息的题目来，哪怕是采取非主流文学的方式，则对林语堂的创作构成一种

考验。如果可能，就可为中国新文学向西方介绍自身并被接受开辟一条有效途径。林语堂正是在这点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例如《京华烟云》，在西方人极为熟悉的语言形式中，既完成了用文学形式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任务，又倾注了他由祖国现实命运激起的爱和恨。其中借庄子所言对民族命运所做的严肃思考，对传统的为官之道、处世哲学和“万事不变”现实秩序的否定，乃至艺术构思、表现手法上对《红楼梦》的诸多借鉴、化用，在西方文化世界都激起了反响，而林语堂以其东西互补的文化观来勾勒 20 世纪中国人寻求精神出路的一种面影，既留摄住了历史的真实，也有利于西方人从他们熟悉的文化层面出发来了解中国文化。林语堂 40 年代另一引人瞩目的作品，历史人物传记《苏东坡传》也不仅反映了他考察、表现历史的独特视角和方式，而且包涵了战争环境中一部分中国人的生存体验。将这样的信息传达给西方世界，构成了战时对外文化交流的一种内容。

林语堂 40 年代的文学创作收尾于他的第 3 部长篇小说《唐人街》。小说借美国唐人街一对中国青年的悲欢离合，描写了中华人文传统在海外华人社会的承传、应变及其同西方文化的互补。这一主题后来成为海外华人文学的一块基石，它的深入开掘成为 20 世纪后半叶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侧面。《唐人街》在这上面的开拓意义，理应引起研究界的重视。

40 年代林语堂写作的重心自然在于将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当时写作的《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中国印度之智慧》等书，书名以“智慧”一词一以冠之，便可见一斑。这种强烈的文化意识使得他的作品在 40 年代的中国文学中更多地作为一种文化品格而存在。即便在民族存亡之时，林语堂也往往以文化使者的意味，表现出其民族志士的姿态。抗战期间，林语堂两度回国，但又最终旅美，便是这种选择的结果。不过，如果着眼于林语堂的创作个性，林语堂作为一个文化人来

创作，既可能激发他的创作巅峰状态，也可能给 40 年代的中国文学带来一些独异的色彩。即便在战争的动荡环境中，创作的文化意义也是不可忽视的，许多战争实质上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抗和冲突。林语堂此时孜孜不倦于用文学作品向西方世界传达中华人文文化的历史和现实信息，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40 年代文学在形成祖国内地多地区格局的同时，第一次同海外华人华文文学形成强态的呼应，似乎可以说，华文文学第一次打破在祖国内地孕育发展的生存格局，其本土自足性第一次有可能代之以跨国别、跨地区的开放性，从而带来华文文学的一系列变革。林语堂的创作以英文为载体，在欧美西方世界、华人社会传播，同时又以中译本返回本土，并产生影响。而其创作的文化视角拓展了其作品被欧美世界接受的可能性。这种传播方式和过程使林语堂的创作在改变中国文学的自足生存体系，促使其走向世界中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的影响所及，直接联系着 20 世纪世界华文文学创作格局的形成。

有了林语堂，我们开始进一步思考：中国新文学可以在一个多大空间中获得生存发展？而今天华文文学成为一个包括中国大陆、台港澳地区、海外华人社会文学在内的文化网络时，我们也会开始思考：华文文学的开放空间会有多大？在这种思考中，我们也许该呼唤：再出几个林语堂！？

目 录

再出几个林语堂（代前言）	1
--------------------	---

第一编 20 世纪华文文学整体观

一、共生、多元、互动

——20 世纪华文文学史的基本线索	3
-------------------------	---

二、20 世纪视野中的文学典律构建	12
--------------------------------	-----------

三、变动不居：20 世纪华文文学的文化态势

——整合 20 世纪华文文学的一种视角	25
---------------------------	----

附 录：华侨文学·华人文学·华文文学	39
---------------------------------	-----------

四、多棱的文化投影

——20 世纪华文文学中的宗教影响	47
-------------------------	----

五、雅俗何以兼容，又如何整合	63
-----------------------------	-----------

六、原乡的追寻

——从一种形象看 20 世纪华文文学史	75
---------------------------	----

文化转换中的世界华文文学

附 录：唐人街：异域的“原乡”栖息地	91
--------------------------	----

第二编 澳美欧华文文学研究

目 一、从“原乡”走向澳洲	101
录 二、“黄金”国度里的“草根”文群	116
三、“诗”的中产阶级	
——对美国华文文学存在形态的一种文化考察	127
四、寻乡的绝唱	
——从王鼎钧的旅美近作看今日华人的乡恋乡情	139
五、“餐馆文学”的文化视角	146
六、散聚之间	
——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华文文学的文化姿态	154
七、边缘位置中的文化观照	
——文化转换中的瑞士、德国华文文学	165

第三编 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

一、双重家园构筑中的百年东南亚华文文学	177
二、从华族文化到华人文化的文学转换	
——对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趋势的一种考察	187
三、微型小说同海外华人社会	197
四、论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本土特色	208
五、恒久追问中的马华文学的文化属性	218

目 录

六、马华新世代的话语实践	224
七、东西方文化撞击交汇中的新加坡华文小说形态	234
八、禁绝中的火种	
——印尼华文文学管窥	248
九、从三聘街走向世界	
——八九十年代泰华小说概观	255

目
录

第四编 台港澳文学研究

一、从“台湾文学经典”看台湾文学精神	268
二、台湾文学中的地域文化差异初探	277
三、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心理的生动解析	
——对台湾原住民文学的一种考察	285
四、消费的文学和文学消费	
——对近 30 年香港文学的一种考察	294
五、并非歉收的澳门小说	306
六、澳门文学纵横谈	317
后 记	335

第一编

20 世纪 华 文 文 学 整 体 观

共生、多元、互动

——20 世纪华文文学史的基本线索

80 年代中叶，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等提出“20 世纪中国文学”的范畴，拉开了重新整合中国新文学史的大幕。80 年代末，谢冕提出“百年中国文学（1895—1995）”研究的思路，力图将中国新文学史整体性的学术框架落实于具体的操作实践。它们的开拓性、创造性意义，正处于一个令人兴奋不已的显示过程中。而我们不成熟地提出“20 世纪华文文学”的概念，是尝试着从生存空间上拓展考察“五四”所诞生的民族新文学的学术视野，以呈现出以白话文为话语载体的中华新文学赖以生存的整体性基础。

20 世纪华文文学的生存空间大致有这样两个层面：一是跟地域联系在一起，又由政治体制、语言文化环境、自然风俗人情等互相隔离开来的社会空间。20 世纪的世界文学中，似乎没

有一个民族的文学，像华文文学那样，被百年历史风云所裹挟的巨大冲击力打碎、切割、抛撒到社会体制、人文环境、语言格局、外来影响迥然有异的多个社会空间生存繁衍。现今中国大陆、台港澳地区、海外华人社会华文文学的同中之异，其情味色调质感，决非“设身处地”便能体味；其题旨形象体式，更决非一把批评尺度就能衡量。甚至缘于同一母体的各自独立性也已显露。另一是由文学自身建制提供的生产、消费空间，即有作者和编者（生产者）、读者（消费者）及其公共空间（发表刊物、出版机构、行销市场）组成的文学运行机制。百年来，华文文学的作者构成（如自由撰稿人、自由职业者或政府机关成员）、编者队伍（自由办刊人或官方政治审查者）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在大陆、台港澳地区、海外华人社会更有着巨大的差异。总之，20世纪的华文文学，确实存在着分隔已久，看似各行其是的不同空间，以致我们面对它，常常犹如面对许多个性相异的对话者。

整合20世纪华文文学，是个长期艰苦的学术积累过程。以拼合式的架构罗列不同板块、地区华文文学的异同，或局限于某一时空的特定文学形势来虚泛地谈“中心”和“边缘”等，恐怕都难以进入科学整合的境地。从目前的研究积累看，我觉得可以以“共生、多元、互动”作为整合20世纪华文文学的基本线索，但应该在这上面提倡有个性的学术思考。

共生自然是指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传统同华文文学千姿百态的现实呈现的关系。读台湾著名人类学者李亦园先生关于华侨社会文化研究的文章^①，颇受启发。他以法国人类学大师李维斯陀“意识范式”来说明“马来亚华人社区内不同方言群文化间的整合与歧异”和“不同范式间的互补互成的作用”，而他的研究又是受华德英女士在《意识的类别》一书中“中国文化之所以整合

^① 李亦园：《人类的视野》，第360—38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7月版。

与区域歧异可以并存”的分析的启迪。“意识范式”的概念对于我们整合 20 世纪华文文学是有利的。按照李维斯陀的概念,所谓“意识范式”是指被研究的那一个社会的人所“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文化而建构的“范式”。借鉴这一理论,我们可以把握到,不同板块、地区的作家对华文文学通常有着三种“意识范式”:第一种是每一地区的作家群心目中对本地区文学所建构的范式,可称之为“直接范式”(这一名称和“理想范式”的名称皆借用《意识的类别》一书说法);第二种是各地区作家心目中对中国文学传统所建构的范式,可称之为“理想范式”;第三种是一个地区的作家群对其他文学所建构的范式,可称之为“他视范式”。在直接范式中,人们往往把他们自己的文学置于华文文学格局的中心位置,如果它实际上处于“边缘带”(如海外华文文学),那么它就可能去形成自己的传统,构建相对的中心化态势。在理想范式中,中国传统文化尺度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也成为华文文学维持整合性的最根本原因。某个地区华文文学的直接范式和其他地区对它的他视范式间的距离则最能反映出地区歧异性。

回顾 20 世纪的华文文学,有意味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三种范式之间的关系有很大不同。当民族文化遭受的外部压力比较大时,理想范式的整合作用就表现得较为明显。例如,我曾经考察过抗战时期中国大陆、台港地区和海外华人社会(东南亚、东亚、澳美)的华文文学,发现其在民族文化层面上的同步呼应非常明显。此时,直接范式和他视范式的距离会大大缩小,以至连接或重叠起来。但当民族内部的政治隔阂、社会社区差异增强时,各地区文化着重点得到较充分的发挥,理想范式的直接约束作用减弱,华文文学的地区歧异性得到凸现。在某一时期如需要某种整合力量,某一板块、地区文学就会因此而处于一种特别的地位,发挥特殊的作用。二三十年代,大陆“五四”新文学就对台湾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产生过重大的整合作用。在六七十

年代，台湾文学又曾对整个海外华文文学起过特殊的整合作用。华文文学不同范式之间或各行其是，并行不悖，或调整适合，统摄于理想范式，或“从属”某一范式，以适应特殊境遇。正是这样一些关系，构成了不同板块、地区华文文学的共生状态。

上述情况对于 20 世纪华文文学是极有意义的。20 世纪中华民族一直处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种种激烈变动中，文学生存环境面临的挑战也是多方面的，而华文文学无论面临哪种生存困境（如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面临的政治困境，香港文学在工商都市社会中面临的商品经济冲击，海外华文文学遭受的所在国强势文化压力等），都未泯灭其生命力，相反却提供了丰富的民族文学形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华文文学具有多种范式，而范式越多越能适应各种不同情况。众多的范式正可以看作具有不同适应能力的变异因子，当某种威胁文学生存发展的因素变得严重时，某种变异因子就可以发挥其特殊适应能力，而使文学“随遇而安”，继续生存发展。这恐怕正反映了 20 世纪华文文学的一个世纪性特征。

20 世纪华文文学诞生于中国传统文学自足封闭的生存体系发生裂变以后，传统的大一统格局被打破，多元化的历史进程成为 20 世纪华文文学的生命历程。而要把握 20 世纪华文文学的多元进程，反省以下问题是重要的。

以大历史的视野审视 20 世纪华文文学的多元格局。历史已经表明，中华民族文明的起源就是多元的，但由于我们的民族是个连生活（如服饰、饮食）都被意识形态渗透了的民族，因此过去编撰的历史常常是一元的。然而，文学是民众生活的“野史”，它不承认统治阶级立言的中心地位，它的虚拟的艺术世界实际上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因此，文学从历史本质上讲就是多元的。而 20 世纪的华人一方面共同承受着民族命运的变迁，另一方面又生活在有着不同生活变迁的社会空间里，其喜怒哀乐已有着很

大的不同，这使得20世纪华文文学的多元特征更加明显。

现代化和民族化的互动构成了20世纪华文文学发展的基本态势。而在审视这种历史进程时，我们应该意识到，20世纪华文文学的现代性和民族性也是多元的。

文学的现代化绝非一个普遍的统一的进程，20世纪的华文文学尤其是这样。文学的世俗化、通俗化是一种现代化进程，文学的精致化、“贵族”化也是一种现代化进程。“五四”时期个人主义的艺术追求构建了文学的现代性视野，随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集团艺术”同样体现了现代性的追求。华文文学曾负荷了沉重的使命（不仅指政治使命，也指文化使命，如海外华文文学承担的传承文化、维系血脉的使命），也作过种种努力挣脱羁绊以重获自身，而正是这两种因素的互动，才构成百年华文文学的现代性概念。正如汪晖曾言，“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与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同时发生的”^①，这一悖论式的历史真相成为文学现代性的多元构建进程的基础。而过去我们习惯于对文学的现代性采取一种整体主义的认知态度，结果有意无意地抹杀了文学的多元格局。

民族性的多元格局，更是值得我们审慎对待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及，20世纪华文文学的处境从根本上讲联系着世界性的文化冲突，中国大陆文学在同海外华文文学、台港文学交流时，要警惕以中华文化圈的核心自居的“霸权”心理，防止将中国文化同其他文化的冲突转嫁到海外华文文学上去。而这种情况在我们研究中确实存在。除了以前有学者提出中华文化圈核心的概念外，诸如“大陆文学无疑是华文文学同心圆的圆心”、“香港文学是联系大陆与台湾、中国与海外华文文学最理想的交流中

^① 汪晖：《我们不得不带着枷锁跳舞》，原载1998年9月11日《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报》。